

编者的话

当前，如何塑造与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营造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尽管中国有意回避意识形态对立，却仍受到西方的责难。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何在、中国又应该如何应对？本期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专栏，刊登的是温尧对此问题的最新研究。作者将“讲好中国故事”理论化概括为治理知识传播并指出，一方面，当代崛起国成长于附着意识形态偏见的国际秩序中，有强烈动机展现自身治理知识的独特性和价值；另一方面，随着权力结构压力的增大，守成国基于身份对比和模式竞争的意识形态防范倾向增强。这两种动态相互强化，形成意识形态责难的“正反馈循环”。作者提出的崛起国需谨慎选择治理知识传播的时机，并对其设立合理预期，对于当前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杨双梅注意到拜登政府“回归”国际制度进程中的选择性特征，并就其原因展开了深入分析。作者指出，对美国而言，是否回归相应的国际制度主要取决于该制度是否有助于重塑美国的领导权，即美国能否承担相应的运行成本、能否利用该制度获得收益，以及能否影响该制度的议程设置。该文不仅有助于我们明确美国国际制度策略调整的动机，为中国参与多边合作与全球治理提供建议，还有助于拓展国际制度竞争的研究议程。

通过回顾亚洲地区的经贸合作，沈陈重点分析了导致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017 年以后亚洲地区经贸合作出现差异性现象的原因。基于卡赞斯坦的帝权研究，作者集中探讨了帝权之后的地区制度竞争逻辑，指出帝权衰落引发规范等级关系变动，构成帝权国家、核心国家与其他地区行为体之间相互竞争与博弈的主要内容。作者提醒我们，随着地区制度竞争更多从基于基本规范的同规博弈，转向规范等级关系变动导致的异规博弈，必须重视异规博弈可能出现的极端化趋势，避免地区行为体从关于不同规范的路线之争逐渐固化为不同制度集团的身份之争。

传统观点认为，中小国家与大国之间的不对称经济依赖是后者权力的主要来源之一。查雯和吕蕙伊则另辟蹊径，以对象国领导人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为出发点，讨论促成对象国对中国形成外交政策跟从的条件，并以马来西亚、越南和菲律宾三国为案例对理论框架进行检验。该文强调应重视对对象国的研究和理解，这也与当前区域国别研究的宗旨相契合。

日益加剧的科技竞争已成为当前中美博弈的关键领域，也是我刊关注的重要问题。李明月和顾圆缘以同盟“同一性”困境理论为视角，通过引入技术合作和同盟压力变量，探讨了美国盟友在面临同盟对手也是技术合作伙伴（中国）时的政策选择逻辑。该文对于我们全面把握美国盟友的政策取向，以及中国科技合作的开展，具有一定指导意义。